

一颗心似火 三寸笔如枪

□崔庆蕾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社会变革之剧烈,战火硝烟之频繁,文化碰撞之尖锐,自古至今都比较罕见,与此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也经历了一段颇为跌宕的历程。在这一时期,深受中国“文以载道”文学传统影响的作家们,自觉地将社会变革的内容纳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形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潮流。在诸多优秀的作家群体中,作为后起之秀的郭小川亦深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充满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他一生投身革命的战斗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属性,形成了他颇具个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风格。

所谓“政治抒情诗”主要是指郭小川诗歌中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郭小川诗歌的这一艺术特点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使他饱受争议,有人认其诗歌强烈的政治色彩遮盖了诗歌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然而仔细梳理郭小川的生活历程便不难发现,他诗歌的这一艺术特点与其自身投身革命运动的经历是有着必然联系的。郭小川自中学读书时就已经密切关注社会时事,反思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对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等级压迫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这从他17岁时创作的《女性的豪歌》可见一斑,在这首通常被认为是郭小川处女作的诗歌中,郭小川这样写道:“不,不/日子不能这样过/我们要呐喊/我们要诉说/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改革/我们要把女性的牢笼砸碎/我们要把男女的界限打破/我们不是女性/我们是强者/我们不是美人/我们是烈火……”年轻的诗人意气风发,对革命充满了雄心壮志,对旧社会旧体制发出了最具豪情的呐喊和控诉。卢沟桥事变之后,郭小川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从北平秘密出发,经天津,抵达山西,加入了八路军一二〇师359旅。从此,郭小川正式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从最初的宣传干事到后来的县长、文艺处长,郭小川将自己全身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他和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一样,为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竭尽所能,虽然并没有持枪上阵杀敌,但以笔为枪,他的一首首诗歌深深鼓舞了战友们。郭小川的革命生涯从抗日战争开始,跟随党的脚步走过硝烟与战火,在生与死的考验中,他对党和人民的爱刻骨铭心。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和高昂的政治热情,他为革命战地摇旗呐喊,为新中国建设谱下鼓舞人心的颂篇。

郭小川的诗歌有紧紧拥抱革命战斗和日常生活的主题。长期的革命战斗生涯让他最现实主义主题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之中,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学写作对象。郭小川18岁参加革命,在战火与硝烟中成长,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干部参与革命斗争、参加新中国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小川写下

许多火热的战斗诗篇,反映革命战友的日常生活,抒发自己的革命热情。如反映民生苦难的《痴病人》:“那红色的,狂乱转动的眼晴/那披散着的长发,下坠的鬃髻/那急剧颤跳的嘴唇/那无节奏的舞蹈的脚/那鸡爪般抓打的手/那狼嚎似的叫喊……”一个深受侵略者蹂躏的疯女人形象跃然纸上,她是当时日军铁蹄下千千万万受害者的代表,郭小川用诗歌为她们在人类历史上刻下墓志铭。充满战斗豪情的《我与枪》:“枪——/我勇敢的青春呵/枪——/我生命的卫士呵/我持枪走向永生/我持枪通过原野/河流山岗/城市与村庄/我的路是有仇敌的地方/我的路铺着太阳的红光/我卧时,枪如巨蟒伏草原/我立时,枪如银兔飞在禾苗间/我冲锋,那支枪呀/就化作一枝银色的箭/奔驰着,奔驰着……/直向敌人的喉咽”,革命的豪情与壮志都在一杆枪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整个战争时期,郭小川的诗歌都是这样紧紧拥抱着现实,不管是对苦难的书写还是对革命战斗的呐喊,都体现着他现实的密切关注,写实性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艺术特点。

郭小川的诗歌具有写实性的艺术特点,但他并不是一位简单的革命“号手”,他的诗歌在具有写实性的同时又有强烈的抒情性,他善于把握革命生活中的动人场景,进行有想象力的艺术加工,以更为抒情和婉转的格调表现出来,这使得其诗歌具有了区别于一般革命宣传作品的审美特性。如反映革命生活的《草鞋》:“草鞋的上面/有阳光/有小风/抚以温情的热吻/草鞋的底下/有大地/有浅草/唱着沉实的壮歌/可是,这美丽的草鞋/却忠实守护着我的同志的脚/像旱地里的船只/载着这光荣的旅客/草鞋是负着我的同志的光采/正如土上,以负着草鞋的光荣/而引为骄傲吧”,作者的观察细致入微,一只随处可见的草鞋被赋予了生命的色彩,它在诗人的笔下成为革命战士的忠诚伙伴,追随着革命战士穿行于风雨和炮火之中,承载着前行的重任,郭小川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写作手法,让一只草鞋鲜活而生动,让整首诗充满了浓浓温情。广为人知的抒情诗篇《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抒情诗歌的代表作,尽管作者彼时正身处“文革”的风雨之中,但诗人的天性仍然让作品充满了浪漫的抒情气息。“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静静的团泊洼在郭小川笔下充满了生机,“秋风”、“秋光”、“高粱”、“向日葵”、“垂柳”、“芦苇”都不再是沉默静止的风物,而是成了有生命活力的存在,它们交互互动,构成了一幅浪漫唯美的田园画。

言而喻的。正如诗人在《〈投入火热的斗争〉后记》中写道:“‘投入火热的斗争’,是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庄严职责,而诗,只是服务于斗争的一支武器。——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而是从先人们的许多珍贵经验中得到的一点启示。在我每次提起笔来到时候,我是没有忘记这一点的。我们的面前既然站着各种各色的敌人(社会的、自然界的),我们就不能不把它们除掉。而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他们的烈火般的对新生活的热情,又给了作者以无穷的信心。我时常想:我怎样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情感现实出来;我在探索着和它相应的形式,我在寻找着合适的语言。”紧跟时代主潮对于郭小川成为“时代诗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致

重寻诗人郭小川的心路历程

□张立群

青年公民》几点说明》中,郭小川的“占这个集子的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的,是以反右派斗争为主题的诗。在把这个编好的集子送交出版社时,全国的知识界正处于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工矿企业和农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也已开始了。这是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这个小小的诗集,如果能为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战士贡献一点微力,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满意足了。”也恰恰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证明了这一创作趋向。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结合逐渐发掘出来的资料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不难看到:诗名日隆以及工作成绩的出色,虽使郭小川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参与筹备创办《诗刊》以及逐渐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当时的文艺运动,但在另一方面,郭小川也开始着手创作了日后成为其“检讨例证”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上述作品与诗集《青年公民》的出版时间1957年12月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疏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心灵变化。就现有材料可知:郭小川调入作协,“并非是1955年初郭对胡风集团以数篇文章进行了排炮般地批判,而是同年9月6日,他在作家协会反对丁玲、陈企霞斗争会上对丁、陈具有杀伤力的发言。”(《冰心可鉴,玉壶何存?——郭小川的检讨书》,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然而,现实的残酷斗争并未彻底吞没郭小川潜藏的良好。尽管,在1957年7月初,郭小川以自己写的诗歌,向右派发起令人战栗的《射出我的第一枪》,而在“1957年8月对冯雪峰批判中,他受命唱起了主角,他不但广泛搜罗材料,还利用胡风被迫交代的假供词,批判、攻击冯雪峰欺骗鲁迅。”(《冰心可鉴,玉壶何存?——郭小川的检讨书》)但是,从日后郭小川所作的“思想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到:郭小川本人自认的“我的右倾错误”主要是在“丁玲、陈企霞的处理上”。这一点,结合长诗《深深的山谷》是“抨击了一个类似丁玲的叛徒”,但在另一方面还“表现了对叛徒的某种程度的惋惜情绪”(郭小川:《关于右倾错误和个人主义——我的思想检查》,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则说明了郭小川当时内心的摇摆与波动。这样,在诗歌“政治抒情”的内

经典作家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成果,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政治抒情诗”的“守望者”,而是选择做一个“开拓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郭小川在出版以抒情为主的诗集《投入火热的斗争》之后,开始了新的诗歌探索与冒险,他开始致力于叙事体诗歌创作,试图将更为宽广和深邃的现实生活纳入创作视野,以叙事体诗歌这样新颖的形式来拓宽其文学作品的表现宽度和深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相继创作了一系列的叙事体新诗,这其中《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是代表作。《白雪的赞歌》塑造了一位英雄般的县委书记的妻子——于植的形象,作为一位革命战士的妻子,她在硝烟与战火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她坚强勇敢,革命意志坚定,对丈夫怀有忠贞的感情和敬意,对襁褓中的孩子怀有温暖的母爱,在诗中她高洁的品格如白雪般耀眼,而诗歌中对于于植与医生情感的“暧昧”书写则体现出革命文学中难得的人性之美,它使得于植的形象更为立体和丰满,这种回归人性的情节设计尽管在当时给郭小川带来了一些非议,但在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妙手之笔。《深深的山谷》则以回忆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凄美的革命爱情故事,男主角懦弱自私与女主角英勇果敢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的笔触细腻温婉,对主人公的性格发展进行了细致描述,对男主角在革命中的动摇与毁灭有细致的分析,对女主角在革命中的成长历程有生动的书写,真实地反映出特定革命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也展现出革命战士对爱与美的追求。郭小川借用叙事体新诗这种新颖的文学表现形式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郭小川的诗歌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既传承了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性,又兼具现实主义的写实性,他把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细节进行艺术加工融入诗歌,他用他的诗歌记录社会历史的变革和人民群众的真善美,他把对党和革命的无限忠诚写入了诗行。或许在今天远离历史现场的后来者看来郭小川的诗歌存在种种“不足”,会看到他粗糙的艺术性、看到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看到强烈的政治属性等等,但我们更应该更客观地来评价郭小川的诗歌,应该将其诗歌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去解读。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郭小川对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初衷有清晰地解释:“那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墙书写动员员标语一样。那时,我既没有思索多少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平常又没有留心去捕捉积累生活中的形象和语言,只是随性写来,不加修饰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想。我的出发点是简单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识,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郭小川文学创作的初衷更多地源自于他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的感情,源自于他作为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在以民族救亡和新中国建设为主题的时代里,郭小川手中的那支笔紧跟历史的步伐,或化作匕首投向敌人,或化作冲锋号鼓舞战友,他的诗歌是一个特定时期的记录,而他是一个时代的歌者。

外之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种心灵的“断层”业已生成。

三、诗的检讨

1958年5月,郭小川见到王任重,要求调湖北工作,遭上级拒绝。1959年4月,郭小川身体一度有病,情绪烦躁。郭小川曾于4月、6月期间几次写信给相关领导。其中,在6月9日的信件中,郭小川曾写道:“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郭小川全集》)郭小川这封信后来被作协打印出来,并立即引起了高度关注。6月20日上午在邵荃麟家中,曾开展了主题为批评郭小川不安心工作与《一个和八

重寻诗人郭小川的心路历程

□张立群

个》的谈心会。郭小川上述经历在其后来“思想检查”中被自我总结为“个人主义”的错误,并与其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我实际上是把创作放在第一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或从属地位的……《望星空》,根本上还是个人主义问题,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总是会感到空虚的。”

郭小川的“自我检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一阶段可能获得的组织评价。当然,从诗人心态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更应当关注其“检讨时期”的创作内容。以可以集中反映这一阶段心路历程的《望星空》为例,这首1959年4月初稿、1959年8月2日二次修改、1959年10月改成的作品(《郭小川全集》),曾有如下的诗行——“呵,/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说什么./身竟气盛./乃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显然,这种心境是诗人突破对现实的满足感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情感体验。除了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反思之外,自然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心态,也构成了《望星空》一唱三叹的情感基调。然而,这种个性的真实呈现却必然会获得“虚无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指责。

值得补充的是,按照《作协批判会议发言记录》可知:郭小川写于这一阶段的诗作《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致大海》《望星空》《将军三部曲》等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在整体评估郭小川1956年至1959年几年诗歌创作之后,当时发言记录曾有五点“零散性”评价。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大致可以明确郭小川为何因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其心境也大致可以通过以上“批判的文字”和“检讨的文字”获得相应的感知。

四、从再创作到自我超越

按照后来一些知情人的说法,1953年3月调任北京之后的郭小川及其承担斐然的诗歌创作,大致呈现了如下的历史

大海总是给人提供奔放自由、博大精深、包容万物的文化意象。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吟咏过大海。我国当代诗人郭小川,也有一首广泛流传的抒情诗《致大海》。这首诗1956年7月初稿于青岛、12月改于北京,1957年刊于《诗刊》第2期。这是一首以大海之镜来观照自我人生的抒情诗,令人读之心灵震撼。

郭小川早年在北平求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40年底,他进入延安学习与工作,成为一名“延安诗人”,也自觉完成了由青年知识分子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角色转型,真诚讴歌新生活与新的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当代有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人,创作过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其诗歌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中被称为“郭小川现象”。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指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创作这首《致大海》时,已经是中国作协的一名“诗人干部”,直接参与对“胡风反党集团”与“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与处理。身处文艺界风口浪尖的他,时时要承受更多的精神与情感压力,自然也有困惑与迷惘、矛盾与忧虑。这样,他才有了面对大海急切倾诉自我人生的抒情诗《致大海》。

《致大海》是一首典型的“借景”抒情与明志的诗歌。诗人立足现在,借大海之镜,审视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未来。诗人这样起笔:“大海呵,我又一次/来到你的奇异的岸边……”面对大海,诗人不断回忆自己的人生,也情不自禁地作着人生的反思。少年时代,“我反抗着,怨恨着,只不过是為了个人的命运/取得些微的改善”。因此,年轻的个人激进主义者的诗人,“跳出日本侵略者的铁栏”,“登上那飘着英国旗的商船”后,还是找不到方向,“我也仿佛沉入海底,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年轻的诗人甚至感觉到:“夜风呀,吹去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可怕的梦幻,残忍的世界呀,何处才有/这个脆弱的生命的春天?”甚至黎明降临,诗人踏上海滨的林荫大道,并在沙滩上思索几天后,仍只有狭小的心灵空间,“与其说是为灾难中的祖国报效,不如说是为了在反抗侵略的战争中/索取对于个人的酬劳”。诗人晨起推窗,在阳光满地的草坪上,微风轻拂,一波又一波的绿水浮动著。诗人槐树大海的博爱,大海的博大宽容没有改变自己。而只有参加八路军后,诗人在“古老而破落的城堡”当中,在红色革命的圣地,被“殷红的大旗”卷进风暴。严谨的部队纪律和党的思想,将他改造成一名有血性的战士了。至此,诗人也完成了从青年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战士的生活与精神转型。

而现在再次来到大海边时,诗人是“以战士的激情”向大海致敬。“我就是海,我和海的每一呼吸/都是这样息息相通”。正因为这样,诗人再次展开更深刻的人生反思。在博大的大海面前,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对自己身上存在的个人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与清算,“现在,我总算再一次地/悟到了我的明智的神圣,让你的圣洁的水/洗涤洗涤我的残留着污迹的心灵”,并且再次急切表达他想在大海中“永生”的愿望。最后,诗人以4个激情洋溢的递进性排比句表明心迹,进行心灵的自我完善,诗人愿像海燕、像朝霞、像春雷、更要像大雨那样,情感与心灵收束到统一的格调:“普降天下,使禾苗滋长,使大海欢腾……”全诗末尾境界豁然开朗,陡然提升,气象宏大。

《致大海》是雄厚的,并不只是单纯地描绘着一个形象,而在形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意象符号。诗中大海的形象非常丰满,蕴含寄寓着丰富的思想。因此,诗人笔下的大海,就不仅仅是碧波涟漪,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自然之海,更是心灵之海、思想之海。自我审视和追问是一个哲学命题,全诗内容浑厚、思想丰富而深刻,是与诗中的哲理意味分不开的。诗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进行渲染和铺陈,讲究节奏和声韵,使全诗激情澎湃,荡气回肠!

郭小川首先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然后才是一位诗人。诚如诗人自己所言:“诗必须是强烈的,无产阶级的诗更必须是强烈的,我们的文艺无一例外地有一个统一的战斗风格,就是强烈。”在他的诗中,始终在呼唤着我们要到代替黑夜的东西,呼唤着我们站立起来,投入革命的怀抱中去。郭小川又是一位敢于思考、有自觉艺术追求的诗人,不断追求“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在《致大海》之后,他又创作出《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探索心灵的诗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当然,他也因“有错误倾向和不健康的情绪”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这首以大海之镜观照自我人生的《致大海》,折射出特定时代的信息,如诗人情感的迷惘与忧虑,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统一,以及时代的文化气质等等。正因为如此,今天读者仍能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

化过程——

一方面,他是遵命地从事行政工作和文学创作的,强调党性、阶级性和共性;一方面,他是将他的主观能动性尽量发挥出来的,这就是独创性、特殊性和个性。前者为领导所赏识和表彰,后者则为时代所不容,自然受到清算了。

不错,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让生活更美好吧》,曾以火热的激情、进攻的性格、美好的憧憬,燃烧过亿万人的心,鼓舞过亿万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创造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然而对于这样的跳跃式政治抒情诗,诗人本身仍持保留态度,他真正感到满意的是他那几首蕴藉深沉一唱三叹的叙事诗,诸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至于抒情诗,他比较喜欢《望星空》《致大海》和《山中》这几首。但他哪里会想得到,他所满意和喜欢的,恰恰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敏感时期极左思潮所要诛笔伐的。(王一桃:《复杂的环境和矛盾的人物》,郭晓蕙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但无论历史怎样曲折坎坷,郭小川都无愧于那个时代有责任、进取心和艺术良知的“战士诗人”。正如他在1959年出版的《月下集》“序言”中指出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我的出发点是简单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我相信,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伟大的时代里,一个诗作者只要是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只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就会有诗’。而在此前‘新民歌运动’的一次《诗刊》编辑部的发言中,他更提到了当时应有的发稿标准:‘《诗刊》选诗的标准,当然应该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并做到两者的统一。’有些东西,只要内容适合于现实形势(如反映中东人民的斗争)的,在政治上表现着新鲜的思想感情的(不是概念化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一些。另外,在政治上没有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我认为也是可以发一点。”(《诗刊》,1958年8期。)显然,郭小川是“矛盾”而“清醒”的,但特定年代的话语方式却使其只能以检讨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写作。

如果说一次又一次批判造成郭小川必然对自己的创作改弦易张,那么,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名作《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林区三唱》《祝酒歌》等,都显得诗质“透明”了许多。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2月,郭小川曾以虔诚而集中的写作方式传唱出一曲曲颂歌。然而,“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宽恕这位诗人。郭小川1966年再次遭到批判,1968年被关押,从此反复写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成为他的日常生活。郭小川1974年12月被押送至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后辗转返京,却已是疾病缠身。在这样的背景下,看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作品,那些被外化为“两行诗”的句子充满着自我灵魂的剖白——“……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人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嘲骂;/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暗。’”(《团泊洼的秋天》)诗人依然在“政治抒情”,但经过历史的浮沉之后,这种抒情已成为一种生命的超越。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那激情万丈的情绪,而一个时代的诗人典型及其承担的意义,正由此获得了“历史的定格”。

7

以大海之镜观照自我人生

□梁爽

——郭小川《致大海》赏析